另一角度看戈爾・維達爾

紐約隨筆

紐約客

與我同時代的美國作家中，我最欣賞戈爾・維達爾（一九二五至二〇一二）。此前我曾多次撰文推薦。最近我家附近一家影院放映一部有關他的生平紀錄片，我破例（由於身體不支，我早已停止每周看一部新片的習慣）前往一觀。

紀錄片內容豐富，評論詳實，看過猶如讀了一本他的傳記。片名是「Gore Vidal：The U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戈爾・維達爾：健忘合衆國》），借用了維達爾一向的嘲諷意味。他以許多歷史小說成名，而我則特別喜愛他那些批評社會不公的辛辣雜文，往往令我想起少年時閱讀魯迅的爽快感受。（推薦閱讀他的《Mmsters Of Fact Aad Fiction》）

上世紀六十年代，維達爾常在電視討論節目上與另一著名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爭論，兩人脾氣執拗，某次幾乎動手打架。我看得最有勁的是他與右派保守作家威廉・勃克萊（William Buckley）針鋒相對的爭論，他能一下子把能言善辯的勃克萊弄得啞口無言。記得某次他們討論社會經濟不公，他指出，全美人口中，百分之五的富人擁有全國百分之二十的財富，而最窮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只佔有全國百分之五的財富。

五十年前，這是很大的差異，已令人驚慌。但是半個世紀後的現在，貧富差距更大。我不知維達爾如果活到今天，將會做何評論。今日的社會趨勢是富者更富，窮者更窮，所謂中產階級，已在迅速消失。維達爾如活到今日會被保守人物斥爲「社會主義者」。可是看看現況，甚至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了更大規模的貧富懸殊現象。

勃克萊早已於二〇〇八年逝世（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可嘆今日電視節目上的辯論，再沒有上述兩位行家了。

維達爾是公開的同性戀者（他崇拜英國作家王爾德）。這部紀錄片把他描寫成「悲觀的政治預言家」。片中大量引用他的言論，顯見他對社會虛僞人物恨之入骨。他自己是望族出身，是已故總統肯尼迪夫人傑奎琳的遠親。他以貴族身份詛咒美國富人「健忘」，不顧被社會排斥的貧民。「健忘合衆國」之名因此而生。

他的言論往往充滿對富有階級的諷刺，控訴他們不但「健忘」，而且涉入虛僞政治。他蔑視美國虛僞的社會掌權者們。由於他是歷史小說家，可以引經據典地指出歷代總統治下，美國社會的不公，以及一般人相互妒忌，爭權奪利。

紀錄片的第一個場景就顯出主人公的個性：他坐在不久即將埋葬自己的墳墓旁邊，手執枴杖，滿臉譏諷地接受採訪。

維達爾自幼喜愛寫作，他的第一本暢銷書是《城市與柱子》（The City And The Pillar，一九四七），書中他坦陳對同性戀的看法。在那個時代，社會上很少有人膽敢公開談論同性戀。文學界與政治界都迴避這個話題，連《紐約時報》也不敢評論。此書暢銷後他名聲大噪，除出版多種小說外，他也曾去荷里活寫電影劇本。他的舞台劇《The Best Man》影射尼克松總統，在百老匯上演時賣座長盛不衰。

紀錄片盡量迴避詳述他的私生活。他的名句「妒忌乃是美國生活的中心現象」。他說話時，往往面帶輕蔑，一副瞧不起談話對象的架勢。當然，他熟知歷史上的卑鄙人物。他對自己同行也似沒有好感。他批評出版界、新聞界，指控《紐約時報》故意不評他的同性戀小說。紀錄片指出他的大膽公開性取向曾受到性學專家金賽博士讚揚。他的另一本有關雙性戀（Bisexuals）的小說《Myra Breckinridge》出版時（一九六八），也是轟動一時，大刊物如《時間》、《新聞周報》、《展望》、《生活》（後兩種已停刊）都把他的照片做了封面。紀錄片中描述，他與戀人霍華德・奧斯特（Howard Auster）同居共五十三年，直到後者於二〇〇三年逝世。他們生活奢華，居住在意大利南部海邊山坡上的一座華廈。當維達爾年老要回美國接受侄兒照顧時，他依依不捨，非常難離。

紀錄片展示了他的開明政治思想。他認爲肯尼迪總統能言善辯，但是施政不當，將美國拉進越戰泥潭；他認爲里根總統講演只能讀講稿，而小布什總統在他眼裡則是一個「蠢蛋」。關於美國的中東事務，他認爲，「我們的政策反讓回教世界更團結，眞是自找麻煩。現在還只是開始，不久將後悔不及。」製片人問他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留下的影響，他不屑作答道：「誰去管它？」

民族品牌被外資「搶走」？

遐　邇

自由談

曾經風光嫁入法國香水巨頭科蒂集團的本土品牌丁家宜，如今卻被「拋棄」了。截至目前，丁家宜、小護士、羽西這些中國本土曾經的「優勢」大衆品牌，它們在中國經濟逐漸融入到國際經濟的進程中，相繼卻遭遇了被國外日化巨頭「收購」，然後逐步式微的命運。相比大衆品牌，科蒂中國的高端化妝品部則保持着兩位數的銷售增長。歐萊雅也已經悄然將羽西的市場定位從大衆產品部調至了高端化妝品部。

改革開放之初，在地方政府「靚女先嫁」原則的指導下，包括丁家宜、小護士、羽西在內的一大批民族優勢品牌，先後被外資併購或合資。當時，就有有識之士擔憂，「靚女先嫁」會不會使民族品牌集體走向式微？而現實是，我們不得不說，「靚女先嫁」的結果是「嫁錯郎」的案例不斷在增多。針對丁家宜的被「拋棄」，有業內分析認爲，從今天的結果來看，併購雙方可謂是兩敗俱傷。科蒂耗費巨資卻沒有得到相應回報，而本來在中國市場有一定基礎的丁家宜也被徹底消滅了。但中國經濟網評論員、危機管理專家艾學蛟指出，丁家宜和科蒂的「婚姻」也不完全是失敗的。在這場「婚姻」裡，丁家宜本身的創業價值早已體現出來了，他們並沒有虧，虧的其實是收購方即科蒂。丁家宜眞的沒有吃虧嗎？

廣東日化商會秘書長余雪玲認爲，「與歐萊雅收購小護士不同，科蒂等外資併購中國日化品牌，並不是說想藉機實現品牌替換。出現這麼多的本土日化品牌『嫁』給跨國日化巨頭後業績下滑的情況，主要還是與文化、渠道方面的衝突等因素有關。」對此，筆者不這麼看。同是科蒂一個公司的產品，外來產品的銷售在增長，而本土產品丁家宜卻被消滅了，這只是文化、渠道的問題嗎？縱觀我國被外資收購的優勢品牌，不少品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被雪葬的情況，最終很多品牌都沒能逃過沒落的命運。有業內人士分析，之所以國產品牌頻頻出現類似情況，是因爲外企借助收購而進行「曲線打壓」。找尋國內發展不錯的品牌進行收購，借助收購事件，聚集人氣和知名度，之後，再將國產品牌「雪藏」，集中力量發展自己旗下的原有品牌。當你走進超市，面對貨架上琳琅滿目的商品，卻發現沒有或很少有民族品牌，你會作何感想？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或許我們不該斤斤計較產品都是哪個國家的，但誰也無可否認民族品牌凝結着民族情感。特別是當我國許多骨幹企業或優勢品牌紛紛被外資吃掉了，外貿依存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時，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國民眞能無動於衷嗎？恐怕很多人都不會認爲，民族品牌的存亡只是情繫民族情感吧？民族品牌的存亡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否認的。當我國的民族品牌紛紛被外資併購後消滅，誰能淡然處之呢？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反思，改革開放之初的「靚女先嫁」正確嗎？我們所謂的利用外資政策眞利用外資了嗎？還是被外資利用了？在筆者看來，發展民族經濟，保護民族品牌，永遠都是政府的責任。

男拔萃與台灣

陳煒舜

HK人與事

戰後至今的台灣，對於香港拔萃男書院（舊名拔萃書室）並不太了解，唯一的認知也許只有：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母校。實際上，在長達五十年的日治時期，有不少台灣家庭送子弟到這裡就讀。正如一九三五年的拔萃校刊所言：「Formosa is strongly represented at the DBS, and there are many old boys in the island.」當時的台生不難與港生區別：一來他們的英文姓名多用閩南語拼音，二來相對於穿長衫的港生，台生更愛西服。爲什麼台生不遠千里來到男拔萃？這與男拔萃的教育特色，以及當時台灣的社會風氣關係密切。

創立於一八六九年的男拔萃原本是一所孤子院，主要爲貧苦無依的混血兒童提供寄宿服務和中、英文教學。這些混血學生中英兼通，畢業求職時頗受各大洋行歡迎，不少人在本港以及沿海諸口岸擔任買辦。由於教學與就業情況良好，本地華人家庭也逐漸願意送孩子入讀該校。十九世紀後期，日本以「脫亞入歐」爲核心理念的明治維新獲得成功，在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中取勝，迫使清廷割讓台灣。影響所及，不少台灣居民濡染日風，並對歐西文化心生嚮往，但於故國又仍存眷戀。因此，把孩子送入近鄰香港的拔萃書室，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選擇。根據拔萃入學登記冊的名單，一九一一年錄取了一個名爲許武洛的學童，這大約是拔萃最早期的台生之一。一九一七年新校長費瑟士東牧師（Rev. W. T. Featherstone）上任，從英國引入領袖生制度，第一屆首席學生長就是許武洛。許武洛以擅長足球見稱，畢業後與一法國女子成婚，從此定居法國。

對後來的台生來說，許武洛無疑是個值得效法的先例。與此同時，費瑟士東牧師計劃將拔萃發展成一所公學，希望進一步吸納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童。早在上任前夕的一九一六年，費牧便曾到台灣招生。此後幾乎每個暑假，他都會前往中國沿海城市（如汕頭、廈門）及台灣、菲律賓等地，探視學生及家長，宣傳入學事宜。這進一步提升了台生前往拔萃的意願。一九三一年，費牧辭職，舒展牧師（Rev. C. B. R. Sargent）接任校長。舒牧在解決了校內的財政危機後，繼續了參訪外埠這個傳統。一九三五年元月底，舒牧與領袖生A. J. Hulse趁着春節假期前往台灣。拔萃校刊載錄了這段旅程的日記，茲簡列於下：

元月三十日：舒牧乘坐廣州丸抵基隆港。下午四時到達台北。

元月三十一日：參訪台灣神學院、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第一中學校。

二月一日：參觀動物園、台灣神社、植物園、松山、北投、硫磺工廠，晚飯後觀賞日本電影。

二月二日：參觀博物館、龍山寺，下午走訪唱片公司。

二月三日：早上離開台北，中午抵達台中，與當地校友前往城郊村莊遊覽。

二月四日：來到嘉義，前往公園和植物園。

二月五日：乘小火車登阿里山。回城後參觀神社廟宇。

二月六日：登玉山。舒牧與Hulse一時興起，在山巔玩木球。

二月七日：來到台南，與當地校友相見。晚飯後校友招待欣賞馬戲表演。

二月八日：參觀赤嵌城、孔廟、安平港。下午乘車至打狗（高雄），參觀神社及街道。坐舢舨至旗津遊覽。晚飯後乘上返回台北的列車。

二月九日：清晨抵達台北，沐浴、早餐後造訪友人。晚上欣賞日本女高音關和的音樂會。

二月十日：自基隆港搭乘寶山丸返港。

日記不僅反映出寶島與拔萃的密切關係，也忠實紀錄了當時台灣的風貌（各處地名的英文，全部依據日文拼寫，如台北爲Taihoku、北投爲Hokuto、阿里山爲Arisan、玉山爲Mitakayama等）。

隨着抗戰爆發，拔萃校園內情緒高漲。學生們屢屢發表愛國文字，又組織擦鞋團爲國軍募款。一九三九年五月，上任不久的葛賓校長（G. A. Goodban）在諮詢師生意見後，任命一名台生彭英傑爲首席領袖生。此時，部分學生卻指彭英傑爲日本籍（這其實與港人英籍近似），對此決定反應激烈；他們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收回成命，否則採取罷課行動。葛賓認爲權威受到挑戰，堅拒學生脅迫。學生大爲不滿，罷課之餘更阻止同學返校，事件震驚全城。最後，四十名學生遭開除。這些年輕人的愛國熱情值得鼓勵，因此當初他們組織擦鞋團也得到舒展、葛賓兩任校長支持。可是，他們在沒有預先和校方溝通之下採取激烈行動，以致自己、同學和校方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傷害，這是大家都不樂見的。

戰前就讀拔萃的台生，文化心態究竟如何？我們雖不能一概而論，但可看看一九二〇年代入學的張秀哲（一九〇五——一九八二）。他出生於台北煤礦業世家，拔萃畢業後入讀廣州中山大學。在文學系主任魯迅指導下，張氏與台灣同學們組成「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和「台灣革命青年團」，發行期刊《台灣先鋒》和《勿忘台灣》。張秀哲還將淺利順次郎《國際勞動問題》一書譯成中文，魯迅的序文裡，對他爲民衆盡力的誠意和中、日文造詣頗爲稱許。張氏鼓吹台灣脫離日本，一九二七年被日本駐滬總領事館押解回台，兩年後緩刑釋放。一九三〇年，又與蔣渭水在台北策劃「反對增發鴉片吸食特許運動」。台灣光復，張秀哲出任台灣紡織公司協理。然而二二八事變後，張氏遭國民黨特務關押。家人花費鉅款才將之救回。如此打擊令張秀哲的理想徹底破滅，從此隱居書齋，不問世事。其《台灣痛史》、《一個台灣人告訴中國同胞書》、《國民政府之外交及外交行政》、《「勿忘台灣」落花夢》等皆成書於二二八以前。

彭英傑並非張秀哲一類的社運家，他對母校的熱愛卻毋庸置疑。一九五三年，拔萃舊生會台灣分會成立，照片中仍可找到彭英傑的身影。直至二〇〇〇年編輯的校友錄，仍可找到彭英傑及幾位戰前台生的聯繫方法。不久前，我冒昧致電這幾位校友家，遺憾地發現他們已無一人在世。不過，當在電話中提到我是母校校友，他們的家人竟絲毫沒有顯得詫異。由此可推，他們生前對母校的念茲在茲，已經讓家人耳熟能詳了。

▲費瑟士東校長與首屆領袖生會(1918–19)在般咸道校舍合影。前排左一為許武洛

►舒展校長一行參訪台灣（1935）

成功的理由

魯　人

人生在線

他在投遞了三百多份簡歷後，終於有一家北京外資公司同意了他應聘。他下工夫將這家公司的產品作了詳細的了解。但是，公司通知他參加面試的那天晚上，他因工作疲勞早早地睡了。他還莫名其妙地將手機設成了靜音。第二天一早，趕着乘班車去單位，然後是緊張的工作，直到中午，他才發現應聘公司負責招聘的部門主管來過兩次電話。他心裡莫名地一緊，預感間隔時間不長的兩個電話一定有重要的事。趕緊去電話，果然是通知他當天上午去北京參加面試。「現在面試已經結束了。」主管淡淡地說。他努力鎮靜地解釋了未能參加面試的原因，並希望能再給他一次機會。主管考慮了一下，說：「這樣吧，我現在問你幾個問題。」便問了幾個有關公司產品的問題。結果，他對公司產品的了解程度出乎主管的意料，主管又問了他一些其他的問題，他都很坦誠一一回答，這給主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主管便約他面談一次，這次面談更加深了主管對他的好印象。便對他說，自己會向他的上級介紹他的情況，另外因爲他與一些公司招聘負責人多有交往，如果有機會，也會向他們推薦。

幾天後，那主管給他來電話，說他們的地區老總同意再單獨對他進行一次面試，時間是第二天的上午。這個消息讓他很興奮，但隨即又犯了難。第二天上午，他現在的單位開調度會，雖然，與他這位普通員工無關，但他怕會有什麼工作安排，因爲他不在而受到影響。於是，他跟對方說要考慮一下。掛了電話後他總覺得踏不下心來，因爲他眞的怕再失去這次機會。考慮了半天，他又給那位主管去了個電話，詢問第二天下午是否可以？對方沉吟了一下說可以，但要在四點鐘之前。第二天，他乘兩點鐘的班車從開發區回到市內，又乘出租車趕到火車站，再乘城際列車趕到北京。然而，在北京迷路和塞車使他遲到了半個多小時。好在因爲主管對他印象頗佳，面試進行得還很順利，並且應聘成功。

大學畢業後，他應聘到一家國企，所學非所用地幹着簡單而重複的工作。一年的時間裡，除了每日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家，幾乎再沒有一點其他收穫。這才決定應聘這家公司的銷售人員。他不是一個能以滔滔不絕地表述自己的想法來說服別人的人。但是，他很眞誠，可以緩緩地以樸實的語言打動對方；他懂得尊重，會認眞地了解應聘單位的情況，了解了他們產品的方方面面；他也懂得責任，即使在他對一份工作失望時，仍然不放棄自己的責任。一個人的成功，必定是會有多方面的理由的。

錯過也有逆轉時

王兆貴

有名言說，過錯後悔一陣子，尚可彌補；錯過遺憾一輩子，追悔莫及。名言總是精闢的，也值得記取。但若奉爲圭臬，因一時的錯過而消沉起來，就不可取了，因爲錯過也有逆轉時。

經常乘坐公交車上下班的人，等車在所難免。而等車是需要耐性的，否則就只能是自尋煩惱。等車人往往會有這樣的錯覺：你要等的那路車好像老也不來，而不是你要等的車卻一輛接一輛。有時，快要趨近車站，卻見你要乘的那路車剛剛開走，只好耐心等待下一班。錯過一班車，就意味着延遲了抵達目的地的時間，若提前量不足，勢必會遲到。這當然讓人懊惱，至少感覺不爽。坐車經歷多了，卻發現，錯過了一班車未必一定會落後，有時還會超越前車。前車發生故障、臨時拋錨等特例我們可以忽略不計，仍然有多種情形造成後車超越前車。比如說，前車遇上紅燈後選道不利，造成綠燈開啓時過十字路口遲滯。再譬如說，前車抵達前站時停車待客時間過長，等等，都爲後車超越前車創造了機會。

職場風雲同樣如此。那一年，單位新進了兩名品學皆優的本科大學生。一位性格外向，愛好廣泛喜交際，很快有了知名度，不久就被擢升爲部門副職。另一位內秀，坐得住，好鑽研，錯過了幾次競爭上崗的好機會。後來，在一次大型活動的策劃中，這位大學生所做文案富有創意，深受單位領導和同行們的欽佩，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爲部門正職。

搶佔先機當然重要，一步領先爲步步領先提供了可能，特別是在短道競技中，這種優勢更爲明顯，甚至是決定性的。「輸在起跑線上」的遺憾，多屬這種情形。可是在長跑乃至馬拉松比賽中，最終衝線的往往是此前的第二名或第三名。人生雖短，但從踏上社會到事業峰巔再到終身成就，其過程並非短期，機遇也並非一次。起步較早、後勁不足的情況也不鮮見。因此，我們不能因錯過一時之機就懈怠起來；接受教訓，急起直追，爭取後發先至，後來居上，才是明智的選擇；笑到最後的，總是那些既有實力又有後勁，既耐得住寂寞又充滿自信的人。

廣州大東門古今

行　平

文化什錦

大東門、西門口、小北……儘管廣州的古城門已不復存在，但至今仍有不少道路或區域以城門命名。大東門，位於越秀路與中山路交界，是宋代至明清時期廣州東大門所在地。時過境遷，如今大東門一帶商業興旺，但仍留有不少名勝，如化身爲當舖博物館的「東平大押」，經治理而變得清澈的「護城河」東濠涌等，讓人們感受到大東門古今變化。

大東門曾有一段悲愴的歷史。明末清初，尚可喜、耿繼茂攻下廣州，屠城三日。那時清軍從廣州西門進入城區，開始屠殺，百姓紛往東門逃難，由於人多擁擠，許多人經過東濠涌上的橋樑時，被擠入水中，溺死者不計其數。民國初年，因擴展交通，廣州古城區的所有城牆、城門被拆，廣州東城門就此消失。不過大東門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史料記載，位於大東門區域的中山三路清代爲正東門大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街建成馬路，得名大東路，至一九四八年，爲紀念孫中山，大東路更名中山三路。不過，人們依然習慣稱中山三路一帶爲「大東門」。

東濠涌得名於明代，明清時是廣州東城的護城河。它是珠江支流，全長約五公里。明朝時，東濠涌涌寬水深，可通舟船，是廣州城東的水路交通要道。東城門拆後，東濠涌失去護城功能，但依然是廣州主要排水管道，民國時，爲治水患，河涌曾被整治。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濠涌依然清澈可撈到小魚小蝦。改革開放後，隨着城市化發展，大量工業和生活污水流入東濠涌，使它變成「臭涌」。二〇一〇年廣州亞運會前，東濠涌開始河涌整治，經過多期的改造，現在東濠涌已煥然一新，河水清澈，河岸盡是綠色植物，成爲廣州旅遊勝地。如今，東濠涌旁還建有「東濠涌博物館」，它是內地首個城市水專題博物館，展覽廣州市河涌文化歷史。

建於清代的碉樓造型當舖「東平大押」鄰近東濠涌，它是如今廣州仍保留下來爲數不多的古當舖建築。清末民初，廣州有「當舖多過米舖」之說。「東平大押」是當時廣州第二大當舖，典當者絡繹不絕。現今，「東平大押」經改造後化身內地首家典當博物館重新「開業」，館內復原了明清時期當舖典當的場景，並展示了近代典當的文史資料、圖片和實物，重現舊時典當行業風貌。

大東門一帶還有諸多名勝。廣東省人民體育場又稱東較場，它用於體育活動的歷史源於唐代，曾有閱武堂、演武場、東較場、廣東省運動場等名稱，是迄今中國以傳統形式保存時間最長的惟一古體育場，一九二一年孫中山北伐誓師即在此舉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簡稱農講所，始建於明代，原爲番禺學宮，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等曾在此授課，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骨幹；大東門的東皋大道一帶，保留着大量歷史建築，如廣東省農民協會舊址、達廬、增園、皋園、明園、鄒魯故居澄廬等，當中結合嶺南風格和西洋風格的花園式別墅洋房最引人注目；千禧年前後，大東門附近的流行前線、中華廣場、地王廣場等旅遊購物旺地相繼開業，構成廣州市區一個成熟商圈，當下吸引着大批海內外遊客慕名而至，展現了大東門一帶現今的繁榮。